

冷的寺与热的书

► 胡 钰

2021年初始，我参加一个西南联大文旅课题研讨，走进了坐落于昆明市宜良县西山的岩泉寺。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众多青山绿水古刹中此处得以更具雅名深蕴，源于抗战初期西南联大教授钱穆先生在此居住近一年，写作完成史学名著《国史大纲》一书。为了纪念这一学者与这一书，当地政府在此专门修建了“钱穆著书纪念馆”。

走进山中寺里，初看到此纪念馆的名称，甚觉新奇，因一人而修的纪念馆多，但因一人一年一书而修的纪念馆却少见。难得修建者用心，邀请到了钱穆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时年98岁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题写馆名，让此馆更具历史感与文化味。站在寂静的寺中，睹馆思人，八十多年前那段岁月重新回到眼前。

1938年暑期，受西南联大同事陈梦家恳促，钱穆决定为抗战期间的全国大学青年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适逢西南联大文学院要从小城市回到大城市而欢欣，但钱穆听到消息却很懊丧。在他看来，“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为此，他选中了距昆明不远的宜良岩

泉寺，既可兼顾授课，又可有时间安静著书。

初到岩泉寺，汤用彤、贺麟陪同钱穆一道前来。山中清幽，屋中简单，夜里三人一起打地铺睡，汤、贺两人说：“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到。明晨我两人即去，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钱穆回答说：“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窃愿尽一年，此书写成，无他虑矣。”

在此写作期间，钱穆周末去昆明上课，其余时间尽在岩泉寺中，除早晚出去散步外，整天都在屋中写作。平日里，钱穆也与其他人很少说话，后来他曾回忆，“乃有每星期四日半不发一言之机会，此亦一生中所未有。”寺中之清冷，可见一斑。

寒假时，陈寅恪曾来岩泉寺看望钱穆并住了一夜，感慨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寺中之清冷，可见一斑。

在纪念馆中读到许多记述当年著书活动的文字，极其生动，场景犹在眼前，有时会心而笑，有时又沉浸无语。走出纪念馆，沿着寺中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科技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等职。

石阶登山而行，满目青翠，早晨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缝洒在地上，斑驳点点。寺中除了我们一行，没有其他参观者，静谧之极。或许是太静了，或许是温度低，我不自觉地把羽绒服扣得紧紧的。寺中之清冷，可见一斑。

踱步寺中，我能想象当年钱穆先生一人在此踱步的场景。我更想到，当年钱穆先生在这种清冷的环境中，是靠什么东西取暖，是靠什么信念支撑，仅用一年就完成这部通史巨著的呢？

《国史大纲》一书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成为“部定大学用书”，即大学通用历史教科书，成为抗战期间教育中国青年的重要读本，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著作，至今八十多年来不断重印，影响了一代代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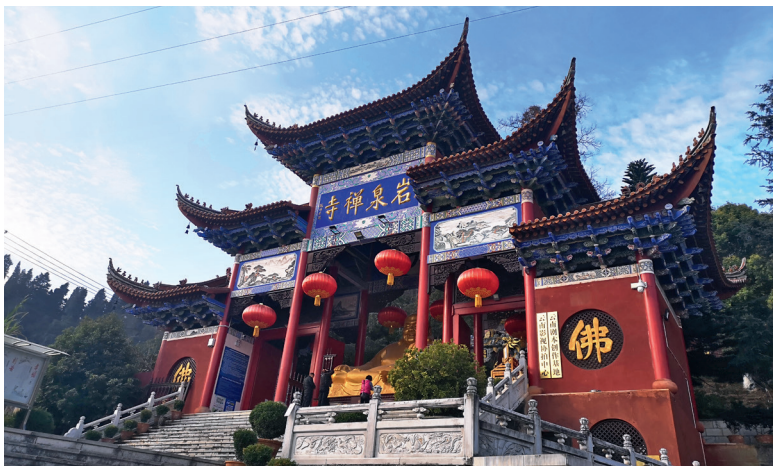
这本书很特殊的一点，是扉页中列出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

信念”，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如此强烈，如此“强制”，很是少见。

信念之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此一信念，告知读者，必知国史，方为国民，而且，即便知道其它知识再多，只是“有知识的人”，而不是“有知识的国民”。对国史认知与国民身份认同的线性关系，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信念之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此一信念，告知读者，对本国史要带着感情读，带着“温情与敬意”读，如此区别阅读本国史与外国史的态度，令人读之动容。

信念之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此一信念，告知读者，读本国史要有尊重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避免历



岩泉寺外景

史虚无主义，避免浅薄的进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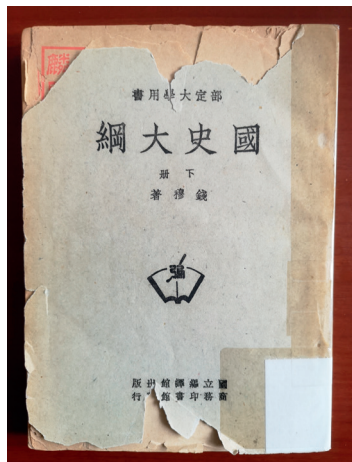
信念之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此一信念，告知读者，唯有对国史的共同认知，对民族文化的共同自信，国家才能实现自主性的发展，而不是被动性的乃至殖民地式的发展。

作者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溢于笔下，对历史教育之于国家发展、民族自立的重要性的判断深刻有力。读着这些文字，可以让人热血沸腾，亦可以感受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满腔热情，再想到写作时中国面临的被外敌入侵的惨烈景象，更觉作者虽一书生但以笔报国、以笔统帅千军之伟大！事实上，在

寺中踱步时，反复吟读这四条信念，身上已无凉意，心中更无孤寂，由此也就知道为什么作者能够在清冷的寺中坚持下来了。

1939年1月，钱穆在岩泉寺写就《国史大纲》一书的“引论”，开篇即讲到“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但“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

“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今人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作者在文中扼要阐述了对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社会组织等的看法，批判了由于近代中国落后而自我否定、全盘欧化的认识，对于那种要“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思想之旧传统”的做法痛心疾首。作者笔下常带感情，认为当前抗战与建国，“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



1953 版国史大纲封面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写成，其恩师吕思勉为书校稿



各种版本的《国史大纲》



钱穆在宜良期间授课

于我先民文化所胎自身内部获得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这篇引论长达2万字，在书出版前先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旋即引起学界震动，也完整展现了钱穆的历史文化观。陈寅恪看到《引论》后，对来昆明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其昀说：“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于是，张其昀又来到岩泉寺中，

将陈寅恪此言告诉钱穆。待书出版后，钱穆专门致函陈寅恪征询意见，回复是“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

1938年6月，钱穆在岩泉寺写就《国史大纲》一书的“书成自记”，讲述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许多自谦之语，也解释了因缺乏参考文献而注释省略等问题，恳请读者谅解。文中有言：“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暴寇肆虐，空袭相随，

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而刊布。”读到这些文字，令人更添钦佩之情，在如此颠沛流离之境，处如此清冷孤寂之寺，加之外寇入侵与敌机空袭，作者一日日一夜夜一字字写作完成此30万字著作，更显不易。其间甘苦唯自知，笔下情绪今仍感。书中有历史叙述之理性，更有民族自强之血性。待书出版，“屡印新版”“有整书传钞者”“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文化抗战，教育报国，钱穆先生实属西南联大乃至全国学界之楷模！

1941年11月，鸦片战争一百年之际，钱穆作《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一文，批评了那些认为中国人两千年来闭关自守等流行的“历史的叙述”，以史实说明这些都不是“历史的真相”，特别强调不要因为近代中国顿挫与欧美兴盛平行而对民族传统文化妄自菲薄。“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其实，所有的今天都源于昨天，所有的成功变革都扎根在历史深处，没有对历史的真正了解与尊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进步。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百年的奋斗是五千年文明史的组成，下一个一百年的进步依然是五千年文明史的组成。

《国史大纲》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题目为《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要知这是在抗战刚刚全面展开、中方军队节节败退之际，作者有如此必胜之信心，有如此世界之眼光，有如此慷慨之气度，更显不易。有意思的是，本节内容极短，仅两句话、一行半字，第二句话也是全书最后一句话是“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想来作者到此收笔，言简意长，一年奋笔终有成，其时释然也欣然。

到了晚年，钱穆八十多岁时，曾写作《师友杂忆》一书，其中有大篇幅回忆在岩泉寺著书的情景，提及寺中僧人、道人及女佣，回忆当年生活细节，异常细腻，读来有趣，也可看出这段时日对钱穆的特殊意义。钱穆回忆道：“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完成。



钱穆著书纪念馆

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抗战胜利后，余重来昆明，每念岩泉寺，乃偕友特访之。”对当年深山古寺著书之经历，留恋之情溢于言表。

钱穆忆及寺中“常有松鼠一群，在树叶上跳跃上下”，按此记述，我在寺中寻访，虽未见到一群，但也见到一只，神态可爱。亦见到一位寺中僧人，热情健谈，还帮我们拍照留念。还见到寺中一位女居士，聊了些许寺中日常情况，临别送我一袋盐和一个苹果，说是结缘。当然，最感谢的，是纪念馆馆长，讲解激情而细致，饱含着对抗战期间这段特殊著书经历的感情以及对钱穆先生的尊重。与馆长相谈甚欢，待我自行从山上寺中转下来，馆长交与我一份毛笔手书文字。文中说：“钱穆著书纪念馆是西南联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清华大学也是西

南联大的重要部份，今有幸教授带队参观游学，特聘先生为顾问。”颇见诚心，甚感荣幸。

纪念馆的大门两边有副对联，上联是“书涵竹韵千秋节”，下联是“墨染泉声万古新”，情境合一，意味深长，也充分印证了钱穆所言：“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钱穆学术、思想与精神的价值日渐凸显。不忘国史，成就国民，凝聚国魂。

2021年清明过后，收到钱穆著书纪念馆寄来的“明前宝洪绿茶”一包。素朴的牛皮纸包装袋上印了一段话，讲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与宝洪茶”的故事，内容摘自钱穆八十岁的回忆文章，读来有趣。看来，这位著书人已经长久地与岩泉寺、宜良县融在了一起。

寺虽冷，书长热。人虽去，名长留。